



信阳现代思想论坛

启蒙 (三) 与开放

QIMENG YU
KAIFANG

王继军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信阳现代思想论坛

启蒙 (三) 与开放

QIMENG YU
KAIFANG

王继军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王若瀚

版式设计:王若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与开放/王继军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607-2

I. 启…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学习参考资料
IV. D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525 号

启蒙与开放

QIMENG YU KAIFANG

王继军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78

字数:10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607-2 定价:89.00 元(全三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61	东岳和明港——思考与探索的起点	吴敬琏(1)
62	书法是凝固的艺术	庞中华(15)
63	企业发展战略与文化品牌建设	吴翀(24)
64	投资环境改善与招商引资方法创新	黄静(30)
65	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	吴庆(36)
66	健康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周宪梁(54)
67	公共管理的伦理问题	晏辉(81)
68	依法治国,构建法治政府	沈开举(103)
69	信阳产业转型与发展战略选择	汪海粟(117)
70	县域经济与名牌战略	艾丰(127)
71	用开放的眼光认识 and 解决“三农”与劳动力转移 问题	蔡昉(152)
72	金融形势与世界经济	吴念鲁(176)
73	中国能源安全、环境问题与农村生物能源 展望	张全国(200)
74	如何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	王在安(222)
75	创新思维与解放思想	顾海兵(262)
76	创造成就成长、创新管理变化	崔卫东(299)
77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30 年回顾与展望	李晓西(312)
78	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和本质	韩俊(336)



79 改革的冲动源于深层的思考…………… 杨宜勇等(367)

跋 从启蒙到开放 …………… 王继军(381)

吴敬琏

东岳和明港——思考与探索的起点

吴敬琏

1930年1月24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国际经济学会执委会成员、国际管理学会会员；《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1984年—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现代公司治理。

启蒙与开放

非常感谢信阳的领导和乡亲们,邀请我们再次回到东岳和明港,纪念顾准先生诞辰 90 周年。东岳和明港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

今天,在这里我想谈一下在“干校”的体验与感悟。我想说这么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回到东岳,互相交流我们人生中这一段重要的经历和各自的体验和感悟,另外一个看到现在这个地区与当年相比有了飞跃的发展,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跟沿海地区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我就说一说在东岳后来在明港这一段“干校”生活,对自己有些什么教育和启发。

“干校”这一段时间不长,也就两年多时间,应该说是 10 年“文化大革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经历,这个经历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现在可以说,是推动我们去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和鞭策我们去为我们国家的振兴、为我们人民的富裕、社会的文明进步做更多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源泉。“干校”应该说是知识分子的炼狱,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可以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很多同志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甚至觉得回忆它都是很沉重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在东岳最后的一个月,在各连之间轮斗,而且每



次开斗以前,都要先把破“眼镜子”取下来。这“眼镜子”就是知识分子耻辱的标志,这是他罪恶的象征。后来好些很有成就的学者讲到在当时险些自杀,但自杀的也有。我们看钱钟书先生给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的前言里面就讲到《运动记愧》,反省自己。语言所这位和他们是一个连队的,后来自杀,在死了以后的斗争会上,钱钟书先生说,他也举过手。对我个人而言,在“五七干校”可谓是不幸之中也有大幸,我自己想至少有这么三件事,是在这里得到的机会,来思索、来定下自己今后的方向的。

第一件事,就是真正冷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在旧社会 and 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向往革命。我从1952年“三反”、“五反”以来就是积极分子,知识分子问题改造的时候我在读大学,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那个时候,训起教授来,也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样。我听到一种说法,有人训我们排的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战士骆耕漠先生,训得像孙子似的。但是在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上,当时我们在那种地位上,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还觉得很自然。后来到了1957年以后,这种运动渐渐地逼近自己。但那好像都还是个别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还是没有冷静下来想一想出了什么毛病。大家都是觉得有“原罪”吧!一直到下“干校”,连锅端,我们还下了决心,说是做一辈子农民了,来洗涤这个原罪。经过“干校”这一番斗争,我们才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不是因为个人的出身或者个人在性格上、思想上的缺点引起的问题。像我们学部的知识分子、经济所的知识分子,你斗我,我斗你,后来大家都轮了一圈,有的还轮了好几圈。我记得,顾准跟林青松、张曙光都说过,你们自以为得意,其实只是棋盘上的棋子给人家推着走。林青松、张曙光一个是连队的头头,一个是总队的头头。后来,这两位都从顾准的话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我没有看到张曙光讲什么,但张曙光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何其意气风发。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我们的排长,后来在大院子的时

候,我们也谈过几次心。这里面的悲剧不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去思索,但这种思索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他的限度。

对我来说,第二件事也是第二大幸运事,就是跟顾准结识,结成忘年之交。有一天在东岳,连长宣布,吴敬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在座的各位也许还记得,当时有一些同志揭发我,说是怀疑康生是我们学部的后台,要我老实交代有没有这回事。我当时就承认了。于是就宣布为帽子拿在手里的反革命,从即日起,进劳改队。要是说干活,我做瓦工、做电工、做木工还可以,但一到劳改队劳动就不行了。顾准就说,你怎么能干这活呢?我是劳改犯了,是老劳改犯了,这种活我来。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交往。原来在批判冶方同志的时候,我是积极分子,我是政治经济学组织的头头,顾准当时是我们的批判对象。这时候地位改变了,我就不说了。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与顾准结识,而且他引导我在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经济史等全世界漫游,开始了我在“干校”这种条件下的每一天。这我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第三件幸事,在“干校”开始了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新的起点。其实,在当时那种计划经济和“左”的路线下,不只是我们知识分子受苦。受苦最深的还不是我们,而是农民。像我这个人,一直在城市生活,做的经济课题也从不涉及农村,农民到底是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到河南省来过,向贫下中农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是到信阳地区,他们是1958年这个学习组的。当时,他们就发现这边的粮食产量是虚夸的,就向中央打了报告,当时带队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是他把这个报告递上去的。所以,一开始“反右倾”,就把邹鲁风调回人大批斗(当时邹鲁风已调到北京大学了)。前几年,我在新加坡碰到邹鲁风的儿子,他告诉我,邹鲁风当时一想“抢救运动”又来了,就自杀了。但是邹鲁风死了以后,在经济学界批判邹鲁风反对“三面红旗”的批判会,我们是参加了。当时批判会上来了很多信阳人,像生产队长啊,贫下中农啊,纷纷控诉邹鲁风,说他诬蔑大好形



势。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到了这里以后,我们才发现,“信阳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邹鲁风批判以后,谁也不敢说。这个地区是中华民族祖先最先开发的地区,是中州,中国就由此得名啊!可怎么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荒地呢?后来清楚了,特别是有些同志去“三同”、去整党以后,“信阳事件”的真实情况才浮出水面,才知道1959年到196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种情况真的是惨不忍睹!远过于书上写的那些事情。

再一个,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林彪摔死以后,管制松了,革命群众都在“批林”,我们不能参加,我跟顾准就在席棚里面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从希腊到罗马,一直到我们的“信阳事件”。顾准比我知道得多,因为他在商城待过,死人的事他都知道。农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知道很多,也讲了很多。他自己说,以前进了城就坐车,根本不知道民间疾苦,“三反”、“五反”以后,他被撤职,才开始知道民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说如果没有这次变动,没有“三反”、“五反”、撤职,我跟那些官僚是一样的。这是当时讨论的一个话题。顾准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道路及见解。应该说这种探索的起点是在这里,是在东岳,在明港。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探索并没有结束,有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楚。最近,高建国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顾准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老实说我并没有完全读懂,有些问题在我头脑中还不是那么清晰,比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背景,还有文化传统,都比较难琢磨,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20世纪的遭遇和它所映照出来的中国的问题是什么?还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李慎之先生去世以后,我看许纪霖有一篇文章,他用了一个词,说李慎之是个老派共产党。我最后想想,顾准恐怕真是老派共产党。像他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是怀着一腔热情,凭着自己的理念,为了这个国家的建立出生入死。但是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娜娜走了,他所看到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我有一些年跟雪寒同志交往很多,他

应该是出生入死,从大革命开始是搞特科的,后来是新四军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他对自己的事不太愿意讲,我说你怎么不写回忆录?他说这个事情不好写,所以不写。但是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走过来的路,天天都在想,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状况?可以说,他是忧国忧民死的。当时大夫说,他有忧郁症,吃药没用。忧郁症不是生理上的问题,是忧国忧民症。他常常气愤地说,我们到底给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中国这种病根到底在哪里?现在仍然不能讨论清楚。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把它理清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可对于我们经济所搞现实经济的人来说,更加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国的不同地区现正处在不同阶段,你拿东部与中部地区来比,应该说是兴旺发达了。但是像赵人伟等人说这个地区,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地区了,但是你去看一看,那里问题也很多,最近比较强调的是生产上的问题,资源节约,环境友善,怎么做到?其实更加根本的是体制上的问题。包括浙江这样的地区,应该说,人们已经达到小康,可是体制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说要出反复就容易出反复。如果继续朝这条路走下去,也就是政府动员一切资源,投向他所偏爱的部门和企业,我可以这样说,像浙江这种地方是走不下去的。水资源的紧张、电的紧张、污染的严重,还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在浙江,我觉得最近两三年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原来被批评为政府不作为的地方开始作为了,它们就运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力,去扶植它们指定的大企业,这是体制上的问题。富裕起来之后,认为原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那些招数不行了,得换招数。像浙江,我的理解,一个是商工结合,结构偏轻,如果商业算轻的话。另外一个是小企业要不要上台阶?上台阶,要上哪个台阶?我认为最重要的台阶就是要建立法制,在法制的基础上使整个市场像非人格化的交易形式。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方向。但至少是最近三年,这个方向变成另外一个方向了。就是集中优势资源去扶植重化工业的大型企业,这种发展的方针或者有的人愿意把它叫做发展战略上的偏差,它的根



源是体制性的。现在像沿海许多地区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上新台阶比爬楼梯更为艰巨的任务。这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有体制上的根源,所以完成起来很困难。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第一个阶段,有人把它叫做原始积累,有人把它叫做第一次创业,这个阶段还没有实现。怎么实现?对于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很重的任务。这个路走了二十多年,为什么沿海有些地区走通了,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些地方这个路走得不那么顺利,成本不小,成效有一些,但是与东部地区差距很远。为什么?这里面还是体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今后怎么走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宋主任在管东北振兴,在这次东北的调查中,发现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回到了过去要项目、要投资的老路上去。如果走到这条老路上去以后,恐怕过去包括我们从50年代开始的高耗费、低效率这种情况又会重复出现。而这些问题也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这里我不再具体去说。下面说跟经济学有关的一件事,就是20世纪80年代评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时候,当时提出一个获奖对象,就是我们所的陈吉元等人写的一篇文章,叫《中国三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的方针、政策,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优点。所以,不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转移劳动力,而是向一种在农村比较传统的非农产业转移,这是第三元。这里说的农村,是真正的农村,不是现在行政区划的农村。后来,讨论的结果认为这一种观点不一定对。所以当年给奖的时候就给了一个对立的观点,给了一个奖,辜胜阻后来当了湖北省的副省长。他是批这种观点的,他认为这种观点不行。后来大家根据经验总结,认为辜胜阻的观点还是对的。中部地区之所以乡镇企业成不了气候,就是因为他们是分散的,缺乏集聚效应。可工商业是需要集聚效应的,所以他们成本很高,办一批垮一批。可是后来发现,我们有一个很大失误,最先提出“三元经济论”的不是陈吉元,而是原来的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他在

北大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先是跟他的导师合写了一篇文章,博士论文就是这个题目。后来有的评委提出来,你给陈吉元他们两位孙冶方经济学奖,但最先是李克强提出来的。这一下就不好办了,评委会也比较难处理。主要是有两个难处理:第一个难处理是有的评委坚决认为要给李克强奖;第二个难处理是这个时候就找不到另外一个辜胜阻了。所以,最后又给了李克强孙冶方奖,也就是三元经济奖。他认为还是要城市化。我们这个经济学的研究还有好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但总的来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纪之交,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横在我们所有做经济学研究的人面前作为前提的大课题。总之,从东岳从明港开始的,我们这些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探索,只是个起点,这个长征还远远没有取得胜利,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随着我们在重新回顾我们在“干校”的经历和缅怀先行者,像顾准、孙冶方等同事的时候,我们还要加紧努力。

刚才大家提出了中部崛起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定位问题、教育产业化问题,下面,我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谈谈中部崛起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中部崛起问题,它本身需要考虑。它和西部地区不一样,西部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基础很差。建国以后,有一些少量的发展,总的来说,它的工商业基础很差。中部地区不是这样,它原来的基础并不是很差。为什么到了世纪之交要提出崛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所以,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为什么作为问题提出来?我没有研究过河南,没有研究过信阳。我想大致上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问题是中部有些地区原来国有经济比重很高,也许在豫北、豫西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湖北省也是中部地区,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我听俞正声书记讲,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有经济比重太高,过去主要把眼睛盯在国有企业身上,所以没有把基层的活力解放出来;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东部地



区,其实也包括东部地区比较内陆的地方,在发展县域经济,在发展农村经济,在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向上,没有用城镇化或城市化的方法,使得工商业产生积聚效应,工商业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乡镇企业其实发展得很好,若乡镇企业发展得不好,从中进一步涌现出中型、大型企业和农村富裕劳动力向现代工商业转移就没有多大可能性。我们地区属于什么问题呢?也许是后一类,而不是前一类。我们是个农业区,本来没有什么大的企业,农业区怎么使农民富起来,使整个经济发展起来,关键在于一点。我觉得过去《中国改革》总编温铁军讲的一句话是对的,他说“农业的文章在农村”,就是说农业的根本性出路在于把它的富余劳动力转到现代的非农产业,就是转到工商业。转到工商业就业,这里面就有很多文章。现在这个情况,有它的有利方面,也有它的不利方面。有利的方面比如说,现在对中部地区的问题提出来了,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积累得比较多。所以,中部地区大多数人都认为,原来那种方针,就是就地转移的做法,如进厂不进城、三就地、向城镇转移。另外一种情况,资源的紧缺越来越严重。所以,投资条件改善的话,有些企业愿意向内地转移,它承接的条件比较好。从经济学上讲,一个地区要发展,一定要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比较优势这个东西是从浅层向深层的,可能它会考虑向内地转移。

所以这就又讲到了县域经济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上个星期我刚从重庆回来,在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启藩讲得非常好。原来准备进上海的两个大企业:一个搞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另一个是做铝电池的,准备进沿海,现在到了重庆。重庆与我们比有它的优势,它的制造业基础比较好,但它有很大的劣势,它的运输难,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它选择这两个产业,都是能扬长避短,发挥它的优势,避开它的劣势。因为,这些企业产品运输量小。道理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但它也有不利的方面,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大量

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很低档次的乡镇企业中去,那个时机已经失去了。当时是一个卖方市场,什么都紧缺。现在是买方市场,要他把钱掏出来不大容易。你的企业在幼小的时候,别人先占优势,你就长大不起来,所以有比较大的困难,但是基本的道理是一样的。跳过去说,李云同志刚才说争取国家哪些支持,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把握国家资源权的专家坐在我旁边。一般性地讲,我们不要老想着国家给予资源上的支持。国家能给的如通信、运输,国家对于后进地区有所帮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国家要给予帮助。这些东西我们叫做公共产品;这类性质的东西国家要给予投资,一般的不要寄希望于国家投资。就说我们这个地区,资金短缺,没有国家帮助,经济就发展不起来了?这个最好看看沿海地区最先发展起来的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浙江。浙江最穷的是温州、台州。这两个地区当初比我们这里条件更坏,而不是更好。所以说它不是更好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认为原来基础不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没有给予很大的投资。温州那个地方,我想我们大多人都去过。台州是属于前线地带,当时完全是没有国家投资的,那为什么它更坏呢?它的自然资源比我们这里差远了,可是它在浙江省也是最先发展起来的。所以,主要的还不是靠资源上的条件、投资、大项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宽松的投资环境,能够把我们地区内外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那么怎么来发展,我来讲一点意见。我刚才说了,要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发展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工业。所以,从走在我们前面的所有国家的经验来看,到了这个阶段,就业容量最大、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有一个特点,加工业它也向服务业延伸。加工业要深加工,深加工一直把价值链延伸到服务业中去。从这个产前服务来说,就是要材料采购、研发、产品设计等。从它的后端来说,就是品牌销售、供应链管理一直到售完,价值链里面越来越移到两头去了,移到服务业去了。那



么我们的加工业怎么延长我们的价值链,那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去看了个厂,纸浆厂的做法是先买造纸板,要买成品,成品的制造里面就有好多原来属于服务业的,研究、研发,还有它的最终产品是营销。所以,这样可以把价值链尽量地拉长。我们的木材加工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地区内部的财力有限,地区外部的引资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引资应该采取多种渠道,外资是一种情况,省内其他地区和省外其他地区是一种情况。还有我们出去了几百万务工的,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能不能把他的一部分业务拿回来做,甚至把他的加工部分拿回来,这就需要一项一项地去研究。农业本身恐怕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好品种的小麦,还有我们现在大米的品种很好,可产量比较低。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当然不一定是县里就能做到的,我们要和省里更多地采取利益分享的办法,请他们来加以解决,这也需要一项一项地去研究。另外一个就是教育,我们的教育可能在全国平均水平上,但是这方面怎么能有更多的长远的打算?所以,这些问题不只是我们一个地区就能够全力做得到的。要和省里、信阳的专家共同来规划,来策划。我在访问过程中,听到有一种说法,似乎很着重用我们本地区的财力去扶植一些重点企业。这个问题我建议要慎重考虑,政府主要去确定支持对象,而不是普遍的按一个标准去支持这个优势的企业,而且是在市场中证明了它是个优势的企业,这样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误。本可以支持一百个企业,但只支持了一两个,把大量的企业关在了门外,即使政府用的是有限的财力,但从一个长期来看,算总账也是不划算的,包括财力很雄厚的地区如沿海地区,或者说我们中央的各个部,搞这个重点支持,恐怕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

再一个,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就我个人看,大部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它不能是企业,它不能是赢利性的。这个问题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地区能解决的。现在国家好像很少有这样基础性的教育是赢利性的,好像就是我们中国,最近有十年